



(上接第一版)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,上海出版始终保持着他的历史传统与风度;一旦迎来社会复兴的机会,上海人总会显示出超群的敏感与精明,迅速占领文化发展的先机。比如几年前,我曾经出版过陈昕先生的著作《出版忆往》。陈昕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,上海出版界的领军人物,他在书中讲述的一个观点,让我至今倍感震动。他说上海出版人的追求,不是一座高峰,而是一片高原;而这一片高原,正是由一座座高峰连绵汇聚而成的。上海出版界是一个制造高峰的文化群落,一代代有理想的出版人,正是用他们亲手奉献的一本本好书,搭建起一座座文化高峰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,才有了今天上海出版群峰并立的辉煌。再者陈昕先生的观点,也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上海出版界的理想与追求。近来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文景、上海书店出版社,还有东方出版中心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等有接触,经常被他们的理想与热情所感动。因此,作为一个出版人,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参加书展,能在这样的城市里“与书共舞”,我们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。

其四,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商业环境。有观点说,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布局中,往往会有两个重要城市为伴,一个是首都,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商业城市。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以及纽约,意大利的罗马以及米兰,加拿大的温哥华以及多伦多等等。那么中国呢?首都北京之外,还有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一线城市,他们都能够成为另一个伴生的重要城市,其标志不仅在商业,更在文化。我觉得,在世人的眼中,上海是有这种担当的城市之一。作为一个从事文化企业建设的人,走南闯北,恍然几十年过去,如今回望以往,你现身最多的城市是哪里呢?在东北工作时,我经常往上海跑;在北京时,我还是经常往上海跑;如今北京草鹭文化树帜,从创意、创新、创业,更要经常往上海跑。跑着跑着,甚至连主体业务都要在上海扎根。为什么?因为相对而



▲沈昌文(左)与俞晓群
▶草鹭文化今年在上海书展推出的新书:《八八沈公》《说徐志摩》《书楼探踪》《性学五章》

言,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浓郁而健康,精细而成熟。这里有优秀的商业伙伴,他们大多有较好的职业素质与契约精神;这里的文化与商业环境,更有服务精神,比如:媒体合作,有澎湃、文汇等优秀传媒;文化活动,有思南书局等优秀机构;印刷品质,有雅昌等优秀厂家;周边文化群落,有南京、苏州、杭州……找寻超级优秀人物加盟,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可选择性。其实当代优秀的企业家,更应该是一位组合大师,而上海这座城市,恰恰会为你提供多种组合的可能。他的城市布局,更像是一个金色丝线织成的网络,让一切运行都显得那样自然而然、有条不紊;一切复杂的活动,都会在那里找到恰当的运行轨迹。

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——“为价值搭台,向品质致敬”

其五,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定位。回忆我从事出版工作已近40年,参加过世界上许多书展,其中参加最多的有三家:一是北京国际书展,二是德国法兰克福书展,然后就是上海书展了。其实在更早的时候,也就是上海书展之前,举办“文汇书展”的时候,我就是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,而且在20多年的时间里,从未间断。为什么?我记得在某一届上海

书展上,组织者提出的口号是“为价值搭台,向品质致敬!”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在那一年,我曾经写文章称赞道:价值与品质,这两个关键词,进一步印证了人们的感受:一座城市崛起的霸气,就这样一点点的显露出来。拆开来解释,所谓“价值”,表现在上海人对优秀图书的尊重,对精英作者的尊重,对懂书读者的尊重。他们不把书展办成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;也不搞过度商业化的大排档、大卖场、大戏台;不媚俗、不唯利是图、不见利忘义。上海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与定性,正是价值二字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。所以他们才会在短短十几年间,创造出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。

再说“品质”,它表现在学术机构和精英学者的到来。你看,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书展主题活动背后,书展组织者设置的不是娱乐明星,不是投机者,不是猎奇者,不是嫩模、作秀、卖萌、八卦、爆料、杂耍等一些低端的事件,当然上海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商业环境与运作能力,也没有排斥他们的存在;但组织者在书展的主题设计中,绝不允许掺杂这样的东西。书展的品质,更需要一些沉稳的学术机构、资深的作家与学者,以及一些风度翩翩的海内外文化精英的支撑。有了他们的奠基,上海书展才会表现出优雅的气质、健康的格调 and 君子的风度。

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,出版人的福地

其六,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。因为上海是我组稿最多的地方。回顾自己的出版经历,毫不夸张地说,我在上海组织的书稿最多,作者最多。像我曾经组织出版的《万象》杂志、“万象书坊”“书趣文丛”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“海豚书馆”等,其中许多资源都取自于上海;我的许多作者和策划人,也都来自上海。及此,我还想起2011年之后,我一直在组织整理上世纪上半叶许多散失的典籍,经常会来上海向专家们请教,去上海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、老牌出版社,找寻那些文化经典的遗迹。整理出《幼童文库》《小朋友文库》《小学生文库》等大批童书;整理出《林纾译文全集》《中国近现代美术期刊精品库》等大批馆藏资料。当然,还有在京海派的专家如谢其章先生的帮助,还有北京潘家园等地淘书的辅助。那样一些经历与感受,甚至让我经常想起“礼失而求诸野”的那一句老话。

其七,我迷恋上海书展,因为那里是发布新书最好的地方。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,我就养成了在上海及书展期间发布新书的习惯;1987年,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

编“当代大学书林”,在上海开发布会,有汪道涵先生参加。1990年代,在上海策划出版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“万象书坊”和《万象》杂志。2000年,在上海书展发布《幾米绘本》,宣读反盗版宣言;与上海贝塔斯曼公司研讨,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。2009年,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,开始与沈昌文、陆灏等人编辑“海豚书馆”,翌年在上海书展上发布。2010年之后,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书展期间,与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组织“两海文库”座谈会,还邀请大批作者陆续来上海书展签售新书或参加活动……

其八,我迷恋上海书展,我的热情至今还在延续。单说今年草鹭文化的奉献,一是沈昌文先生已经88岁了,我们为他出版《八八沈公》,许多沈公的旧雨新知,如王蒙、王充闾、葛剑雄、吴彬、赵丽雅、陆灏、郑勇等欣然命笔,留下真情文章,时代印记。沈公年事已高,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,若外出只去两地:一是去美国看女儿,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。今年书展他还会来,参加《八八沈公》新书发布会。二是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《书楼探踪》,韦力先生有签售,他还会与毛尖有一场对谈。三是江晓原先生的《性学五章》增订本,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发布。四是陈子善的《说徐志摩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也会发布;还有冷冰川、凌子的《凌昕》,也在全力制作之中。

这是这批日记第一次结集出版,虽然要“补”全巴金日记,不大可能,但是为数不少的出访日记结集出版,对于研究巴金的生平活动,乃至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都有着重要价值。日记之外,《出访日记》附录了每次出访后巴金写下的文章,这是他1949年后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把它们与日记对照起来看,才能全面地理解和了解巴金的活动。

沈从文曾在书信里说,巴金、冰心天上飞来飞去……这在政治上无上荣光,生活中却是件苦差事。从这些日记中能够看出,当时出访,少则半月十天的,多则一两个月,东奔西走,迎来送往,日程安排得很紧密,这要占去年过半百的巴金很大的体力和精力。加上,当时国家条件有限,出门更是能省则省,而不是现在想象的看西洋景儿。以致为了节省一点小费,还发生黄佐临写过的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:“说起节省小费,我不由想起,1955年我和巴

读巴金《出访日记》札记

■周立民

金去印度开亚洲国家会议,那里的小费,亦多如牛毛。如,进门时,给你开门要小费;出门时,为你关门又要小费。我和巴金不得不商定,巴金要出门,我出其不意地为他开门;我要出门,巴金又赶紧为我开门,以节省一点小费。”(黄佐临《理发的故事》,《往事点滴》第九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版)

有些出国,巴金也是很畏难,但是这是任务,不得不接受。1954年去苏联出席契诃夫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,他给妻子的信上就左右为难:“我的行期已决定,11日动身。据说第一日坐8小时,第二日坐13小时,两天半到达。这次我

一个人走,连翻译也不好带。因电报是打给我个人的,说一切费用连路费在内都由纪念会担负。不过作协已拍了电报请他们为我解决翻译问题。这次纪念会另外还请了老舍,他不能去,因此我更不能不去了。一个人去的确是个苦差使,而且得靠我这几句洋泾浜俄文。”(巴金1954年7月8日致萧珊,《家书》第一七七页,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)在1958年10月25日的出访日记中,巴金曾记道:“昨夜失眠,5点后被戈宝权叫醒,6点前去飞机场,7:30起飞,9:30前后到乌兰巴托,蒙古作协秘书长来欢迎并招待,10点起飞,1:35到

北京。过蒙古后飞机颠簸较厉害,我略感不适。”长途跋涉的辛苦可见一斑。可是,辛苦只能日记中说一说吧,他在文章中却写道:“10月19日早晨图一〇四喷气式客机载着我们离开塔什干的时候,我仍然有一种节日的情绪:我是多么兴奋,又多么快乐!”(《塔什干的节日》,《出访日记》第一四〇页)那时候的飞机常常“颠簸较厉害”,坐起来并不舒服,文章里不能抱怨,他们还得心情愉快地接受这些“苦差事”。我想,这并非都是外在的命令,也是自我的要求,当时能够接受这样的任务,自然是莫大的荣光;同时,巴金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会认为,这正是自己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,而只有这样,自己才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,才是一个“有用的人”。

(《出访日记》,巴金著,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)